



陈笃彬，男，
1951年生，福建泉州人。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泉州师范学院院长、研究员。



苏黎明，男，
1957年生，福建南安人。1982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为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

泉州古代科举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齐鲁书社

只是个小小的县官,政绩基本局限于一县之中,没有也不可能对全省全国产生多大影响。至于文学方面尤其是诗歌方面,卢琦的确获得当时和后世颇多的赞誉,但这些赞美之辞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卢琦诗歌的思想性,即突出地表现了对人民所受苦难的深切同情;二是元代文学以元曲最有造诣,诗歌方面人才寥寥,相比这下,卢琦的成就显得较为突出。由于科第人物数量稀少且没有出现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因而元代泉州的举业总体上看对泉州社会影响不大。就当时的情况看,它既未能对提高泉州的社会知名度有多大促进作用,也未能对推动泉州文化教育发展产生多大的积极作用。就对后世的影响看,它的影响力更是极为有限,根本无法与唐宋时期相提并论,随着元王朝的垮台,人们很快就对它淡忘了,并没有留下什么深刻的历史印记。

四

明代泉州的科举

明代,朝廷的取仕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科举地位再次大大提高,社会各界高度重视举业,因而,泉州的举业在历经了元代的中落之后,再度兴盛起来,进入一个新的繁盛时期。明代二百七十年,泉州有文举人一千七百三十四名,武举人三百四十七名,文进士五百九十五名,武进士六十六名,举人和进士均占福建全省的四分之一,不仅跃居福建全省第二位,且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科第人物。与此同时,举业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明代泉州科举的背景

明王朝建立后,选仕政策再度回到以科举为主的轨道上,统治阶级大力倡导科举;泉州地方官员一改元代的冷淡态度,高度重视并积极扶持举业;泉州民间社会对举业的热情也再度被激发起来,出现了空前的追求举业的热潮。所有这些,为科举营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举业的发展因此出现重大转折,再度繁盛起来。

朱元璋虽为游丐出身,却颇懂得人才对巩固政权的意义,故对科举取士一事极为重视。早在他为吴王时的1367年,便发布了设文武二科取士的命令,要求各级地方官“劝谕民间秀士及智

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揭开了明代科举的序幕。明王朝建立后,进一步强化科举制度。洪武三年(1370年)正式下诏开科举,并诏定三级考试内容。是年,京师和行省分别举行乡试。次年举行会试,朱元璋亲制策问,试于奉天殿,录取了一百二十人。当时还曾以天下初定,官员缺额甚多,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乡试,举人免于会试,即可赴京听选,一时宠遇甚厚。洪武十七年(1384年)确立了三年大比制度,并规定了详细的科举程式。明初用人除科举外,曾以荐举并用,但永乐之后独重进士科,罢荐士之路,一切纲以科第,抬高进士地位,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不成文法,“能文之士,率由场屋进以为荣”。明代宰辅一百七十余人,翰林出身占十分之九。明代重视科举至于如此,难怪为世人所艳羡了。后世留传的《四喜诗》:“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即产生于明代。明代还规定地方学官任满后须经科举取额及业务考核。洪武二十六年颁布《学官考课法》,专以生员科举业绩作为学官政绩好坏的一个主要标准,规定学官在任职九年间,中举人数府九人,州六人,县三人才能达到优秀。同时规定学官要接受四书五经考核。如果任内生员中举数达优,又通过四书五经考核,便可升迁;如果任内中举人数很少甚至全无者,那便是最差,又考不通经义者,便遭黜降。学官还要接受平时考核,一般由地方官对府县学生员进行季考,由学政对生员进行岁考,如生员无长进,学官要受“罚俸”乃至“罢黜”的处分。如此,学官不能不把注意力高度集中于科举。

明王朝还把学校同科举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明代以前,官学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则明确将其定位为“储才以应科举”,使之更直接地为科举服务,进官学成了科举的必由之路,即参加乡试者必须是国子监、府州县各级官学生员的

考试合格者。1365年,朱元璋就在应天建立国子学,后改建在南京鸡鸣山下,改称国子监,对国子监生给予优厚待遇。永乐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又在北京设立国子监,于是有南北监之分,待遇同样优厚。对地方官学,朱元璋同样很重视。洪武二年下令各府、州、县设立学校。府、州、县学的学生名额,明初规定为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每人每月由官府发给食米六斗。后又几次下令增加名额。生员入学最初由巡按御史、布政使、按察使和府、州、县官主持考试,正统元年(1436年)于各行省特置提学官专理此事。提学官三年一任,任内举行两次考试,一次是岁考,一次是科考。两次考试都按成绩优劣分为六等,三等以上受赏,三等以下受罚。更重要的是,科考列一、二等者,就取得了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所以说,只有进入官学并取得科举生员的资格,才能在科举的道路上一步一步爬上去,所谓“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可不由科举”,说的正是这一道理。洪武八年又下诏立社学,兼有府州县学的预备学校性质。

朝廷对科举的高度重视,不能不对地方官员产生重大影响。明代泉州的府县官员,以及中央派往省的地方教育行政长官,即提督学道或称提学,因此普遍非常重视举业,无不把它作为任上的重要职责,积极采取措施加以扶持。浙江奉化人应履平,洪武年间知德化县,一到任,便积极劝勉和奖励读书人,对尽心向学的人加以礼遇,使德化的举业获得发展,科第人数大量增加。江西吉水人龚颖,弘治年间以举人身份任安溪县令,鼓励科举,发展文教,改建县学宫,建置书院。邱凌霄,隆庆年间知南安县,常常到县学,谆谆劝勉生员用功,应举登科,建功立名。并于边远的乡村,选择资禀较好的读书人,早晚亲自授课。绪东山,嘉靖年间知德化县,不但创建丁溪书院,设置学田,命士子在其间学习,且亲自授课,“日与诸生讲论”。府县学的学官,更是把科举

业绩作为追求的重要目标。洪武元年(1368年)改泉州路为府,辖七县。府学置儒学教授一员,训导四员;县学设儒学教谕一员,训导二员。府县学官虽官小位卑,但肩负着培养科第人才的重任,且自身前途与科举业绩息息相关,因而大多数人总是不遗余力。嘉靖年间泉州府学教授纪日举,终日与诸生讲论经典,剖析义利,循循善诱,被当时泉州太守及巡按称之为“学职第一人”。正德年间晋江县学训导霍球,对生员要求十分严格,自己也尽心讲学,每月按期考课生员。有的学官虽薪俸菲薄,但对一些有培养前途而家境贫寒的生员,不吝捐俸资助。天顺年间以举人身份先任泉州府学训导,不久升为教授的林珪,曾捐资二百金修葺文庙。贫穷学子就学,助其膏火费。生员参加乡试有困难,便用自己的薪俸赞助。他长年讲学不倦,最后卒于学署。宣德年间由举人任南安学教谕的包原明,学问渊博,诲人不倦,同时捐资劝士从学,积极应举。广东人黄结,景泰年间由举人教授泉州府学,整肃科条。两次为预考官,有权贵用重金为子弟向他买通关节,被严词拒绝,被人称为“天下教授学行第一”。晋江人郭贤,成化年间举人,不求仕进,居家教授学生,门生有多人中举人,名噪一时。广东人黄袞,正德年间晋江县学训导,课生十分认真,每次补廪或推荐贡生时都秉公上报,生员贴服。华亭人唐尧宾,嘉靖年间泉州府学教授,讲论有方,诸生多有成就。罗源人张潮,万历年间由岁贡任泉州府学训导,后升任德化县学教谕,任职期间勤勉课督,诸生不少取得科名。

地方官员重视科举的另一个突出表现,则是重视学校的建设。一方面,积极兴修府县官学,“前有作者,后必响之,莫敢废也”。明代二百七十六年,泉州府学进行过十三次修建与扩建,成为“举八闽之学官,未有若是之胜者”。明代进士黄河清《泉州府学记》云:“泉州郡学甲于天下,盖极其仪尽其制,备天下之所未

备。”洪承畴《泉州府学记略》云:“予温陵名邦也,理学文章,籍籍于世,而学宫实陶淑之地,人才藉兹以蔚集,人文藉兹以化成。”明代著名文学家王慎中也说:“泉州儒学,其地据郡之兑方,最胜而广袤,先师之庙,明伦之堂,巍栋华宇,甲于闽中。”惠安县学在明代十次扩建,南安、永春、安溪县学也多次修、扩建。另一方面,积极扶持私学,使明代泉州的私学相当发达。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大兴社学和义学。社学是民办形式,大多数是热心的乡贤出资创办的。因这种办学形式,正好与当时明王朝所强调的相一致。在朝廷几次诏令下,地方官员发动乡村办社学,社学一度相当发展。仅惠安一县在隆庆年间(1567—1572年)就有社学二百一十二所。而书院、家塾、书堂、蒙馆、教馆、义学等多种私学不仅遍及沿海,且向偏僻乡村发展。

不仅官方重视举业,民间对举业的追求也很热烈。私学的发达,实际上就是一种突出的体现。明代的泉州,社会对举业的热烈追求,正式如宋代一样,除了登科中举本身所带来的种种好处这一最基本的动力外,同泉州地区人多地少这一基本现实有着重要关系。明代泉州辖七县,按府志载,嘉靖年间丁口十七万,万历年间丁口二十万,表面上看比元代还少,实际上瞒报很多,远远不止府志所载数字,因此人多地少的基本矛盾并没有解决。严重的土地问题,使许多农民无法保证通过土地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源,必须另寻生存之路。科举也是出路之一。尽管这种出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希望非常渺茫,或许永远只是理论上的出路,但毕竟提供了一种可能,何况这种出路本身非常具有诱惑力。因此,无论家长还是读书的士子,都在这一线希望的支撑下,锲而不舍地苦苦追求。正如明代著名学者泉州人王慎中在《黄晓江先生文集·序》所言:“自科目用人,士无他途以发身,举一世聪明才智并力于此,以伸其好功名之心。为士之众,莫盛于今日,

盖于荐于前有司，从官得位，而沉于卑冗，因于斥甯，终老且死，犹谓之不遇。”（《丰州集稿·启序》）在科举制度盛行的时代，在社会未能提供更多生存途径的情况下，人们对举业的这种执着追求，是可理解的，合乎逻辑的。民间因此高度重视教育，鼓励读书，使泉州教育很普及。《闽书·风俗》载：泉州“儿童诵读声闻于道，士挟一经，俯首休心，……是以缙绅先生，为盛于中原文圃。”《泉州府志·风俗》载：“閩閩山海之间，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贫贱之极，亦以子弟读书为荣，故泉中冠裳之士，往往发自寒薄”。又云：晋江“十室之内，必有书舍。保贩隶卒之子，亦习章句。……大乡巨族，则多社塾”。如晋江草庵龙泉书院，嘉靖年间有位以道德学问闻名当时的叫洪天馨的硕儒，在科场屡屡失利和家庭屡遭变故后，隐居于此专志讲学授徒，所教学生后来有十多人或中进士或中举人或为贡生，一时美名馨芳，传播远近。这十多人是：晋江人庄用宾及弟庄用晦，嘉靖七年兄弟双双中举，次年庄用宾中进士，官至刑部员外郎，后因揭发太宰舞弊被罢黜，时年仅三十一岁；王慎中，嘉靖五年进士；张志选，嘉靖八年进士；蔡克廉，嘉靖八年进士；庄一俊，嘉靖八年进士；蔡克熙，贡生；赖存谨，贡生；赖存业，贡生，为广东琼州教谕时，曾奖掖庠生海瑞；蔡鸾，贡生，教谕；蔡廉，贡生，教谕。教育的发达，为举业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明代泉州举业始终保持了比较旺盛的发展势头。诚如《泉州府志·风俗》云：“泉郡人文之盛，甲于全闽，人占毕而户弦歌……经学之儒彬彬辈出，党塾子弟年方幼龄，多有能诵十三经者。晋邑岁科童子试者几五六千人，他邑亦不减十之二三，虽有佳文，不能以入彀也。”

社会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为举业的繁荣提供了条件。明代的泉州，官营海外贸易衰落，而私商海外贸易却空前繁盛。这种局面的出现，既是土地集中的某种结果，也在于外销

商品生产有相当的发展。织染业最为突出。明初相继在泉州设“染局”和“织造局”，当时全国除北京和南京有织染局之设，苏州和杭州等纺织业发达地区有织造局之设，而泉州则是“染局”和“织造局”俱设，故有“织染为天下最”之盛誉。陶瓷业也很负盛名。德化的白瓷，晋江的陶瓷，都是很受欢迎的外销货。泉州各县的茶叶生产各有发展，又都有外销，而以安溪为最盛。安溪所产的铁器，也有不少销往东南亚。泉州在明代出现了花巷、打锡巷、打铁巷、打线埔等表示专业性生产的地名，晋江有专门从事陶瓷生产的磁灶村，惠安有专门造船的西坊乡等，都说明商品经济的发达。外销商品生产的发展，为海外贸易提供了充足的货源。明代的泉州，除后渚港以外的其他大小港湾，都成为私商贸外活动的口岸，许多无地或少地的沿海农民，利用紧靠大海的地理条件，泛海做私商，作为重要的谋生手段。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云：“泉漳两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代农贾之利，比比皆然也。”在此基础上，出现了私商集团，最著名的有李旦、黄程、李寓西、郑芝龙等。获利颇丰的私营工商活动，支持了泉州举业进一步发展的经济需求。许多从事工商业活动而发财致富的人，在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和“义举”观念的感召下，慷慨捐献钱财，举办或资助教育，赞助举业。《闻见偶录》有这样一则记载：南安人蔡廷魁，少时家贫，后泛海经商致富，于是“构土堡以居族人，立大小宗祠，置祀产，俾族人沾光泽，有服之属无令有鰥居失业者，设书塾捐修脯以课子姓，计所费较遗子者过半焉”。诸如此类，明代的泉州比比皆是。

明代科举仍以《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答案则以朱注为标准，这对泉州举子亦颇为有利，因为其时泉州乃是闽学的中心。朱熹集理学大成，开创了“闽学派”，并且亲自在泉州讲学，培养了一大批朱子信徒，使闽学在泉州有深厚的基础。

这些朱子信徒在泉州不断传播朱子思想,捍卫朱子学说。进入明代以后,泉州因而仍然成为闽学的主要基地,并形成在全国广有影响的清源学派,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朱子学者,如蔡清、林希元、王慎中、张岳、陈紫峰、李光缙等。这些著名的理学家对理学的深入研究,把理学进一步推向高潮,尤其是对较为高深的《易学》的大量研究,使泉州成了易学的研究中心,单论著就有九十八部。“今天下言易者,皆推晋江。成宏间,士大夫谈理学,惟清(蔡清)尤精诣。”泉州学者对理学的深入研究,以及一大批出于他们手中的阐释理学的著作,使泉州举子在科场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这些理学家本身都是科第人物,都是科举范文的大师。如李光地《重修泉州府学记》云:“虚斋(蔡清)以经解,锦泉(傅夏器)、晋江(李廷机)以制举业。……天下皆靡然宗之。”这些名师又各授门徒,如蔡清、罗伦、陈紫峰等,也兴办塾馆、经馆,聚众讲学。因此,泉州士子不仅对八股文非常圆熟,对经义也十分通晓,很多符合当时的录取标准。

明代泉州的举人

明代的科举,具体做法与唐、宋、元代均有较大不同,它以院试为起点,然后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进行。这当中,乡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通常所说的考举人,这是举进士的必经之路。

乡试是三级考试中的第一级考试,但要参加这第一级考试还须先取得一定的资格,即先通过院试,成为秀才。院试亦称童生试,即考秀才,也是府县学的入学考试,因而可作为科举入仕的起点,但属非正式的分级考试。应试者称童生,先由各县知县执掌考试,合格者送府,由知府执掌考试,录取后送学道在泉州

贡院举行院试,录取后便是秀才。秀才录取后,分送为府县学的生员。明制,县学年收生员名额为:晋江廩生员(食廩之生员)二十名,增广生员二十名,附学生员不拘额数。岁科两试,各取进二十名。武生员岁试取进十五名。初入学者一般为附学生员。考取秀才后并不等于自动获得参加乡试的资格,还须再通过一定的考试进行选拔与淘汰。具体做法为乡试前一年,由学道主持对秀才进行一次考试,称为科考,名列头等、二等和三等的前三名秀才,得于翌年参加乡试。生员科试名列三等及新进秀才第三名以外者,经过录遗(甄别考),及格者方能参加乡试。

乡试在明代已成为固定的省级地方考试层级。乡试又称乡闈、大比,从洪武三年(1370年)开始。洪武初年,朱元璋考虑到天下初定,官员缺额甚多,令各行省连试三年,于是福建在洪武三年、四年、五年连续举行三场乡试,分别录取了三十九名、十八名、十九名举人。洪武六年,朱元璋下令中书省科举暂停,又诏令有关部门察举贤才,乡试因此一度中断。洪武十七年,再次诏行科举,并确立了三年大比的制度。从此,乡试成为固定的省级地方考试,基本制度直至明王朝灭亡始终没有出现大的变化。每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的八月举行,考场设在省贡院。福建乡试地点在福州福建省贡院,由钦命主考官主持。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初九、十二、十五三天举行,故又称秋闈。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考生入场,要经严格的搜查,不许挟带。入场后,每一名考生由一名号军监视,防止作弊。黄昏时交卷,如没有作完,给蜡烛三枝,烛尽还没有完卷,就要被扶出考场了。考生交卷后,由主考官与同考官评阅。评阅的时间,名义上是十天,但真正用在评阅上的时间不过三、四天而已。因为试卷很多,不能遍阅,试官往往“止阅前场,又止阅书义”,如果第一场所

写的三篇《四书》义得到试官赏识,就可中式了。凡乡试中式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第二名称至第六名称亚元,又称经魁,第七至第十八名称亚魁,其余举人叫文魁。举人的录取名额,由朝廷决定。朱元璋在世时曾诏“不拘额数,从实充贡”。洪熙元年(1425年)规定了名额,南北国子监及南北直隶各取八十名、五十名,闽、浙各取四十五名,其他各省四十名至十名不等。后又逐渐增加,至明代后期已有七、八十名,但闽、浙、赣仍皆居前列。举人得于翌年参加会试。正榜举人之外,又有增加录取的副榜,称为副贡。副贡要于下科考中举人,才能参加会试。

举人出身者可以授官,故竞争十分激烈。由于想参加乡试的生员太多,为控制参试人数,明代曾规定每举人一名,只允许三十名生员参试。景泰年间,大体以三千参加乡试的秀才,录取举人九十名,万历四十三年增额为九十五名。可见录取比例很低,尚不足百分之四。因举人参加会试录取为进士的比率要高得多,故有“乡试难而会试易”之说,又有“金举人,银进士”之谣,中举因此也甚为风光。

洪武三年(1370年),福建省举行第一次乡试,按规定录取举人三十九名,其中泉州两名,即晋江的陈章应和何德举。洪武四年第二次乡试,全省录取十八名,泉州无人中举。洪武五年第三次乡试,全省录取十九名,泉州生员表现不凡,庄济翁、陈显、沈章、林刚中等四人上榜。随后乡试暂停。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乡试亦成定制。此后,泉州生员的表现一直不俗。从洪武十七年(1386年)至崇祯十五年(1642年),前后二百五十六年,福建又有乡试八十七次,泉州每次都有人中举,尤其嘉靖以后,举人数量更是大幅度上升,每次达到二十人以上的非常普遍。嘉靖末年至崇祯末年,每次三十多人的也很普遍,有好几榜达到四十人以上。如万历四年(1576年)四十四人,万历十六年(1588年)四

十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十一人,万历四十年(1612年)四十人,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四十三人,天启七年(1627年)四十六人,崇祯六年(1633年)四十人,崇祯十五年(1642年)四十四人。此外,有两次甚至达到五十人以上,分别为天启元年

表五:明代泉州举人分县统计表

年份	晋江		南安		惠安		安溪		永春		德化		同安		合计	
	文	武	文	武	文	武	文	武	文	武	文	武	文	武	文	武
洪武	27		1		5		1						10		44	
建文	1						2						1		4	
永乐	58		13		10		2		1		3		19		106	
宣德	7		4		1		1		1		1		1		16	
正统	4				1		1						2		8	
景泰	11		1		3		1						3		19	
天顺	5		1		1										7	
成化	29		3		5		1		2		2		4		46	
弘治	50		9		4		3				1		6		73	
正德	42		9		6		1						11		69	
嘉靖	210	52	28	5	36		5	1	5		1		49	25	334	83
隆庆	59	9	10	4	4	1	1	2	2				10	3	86	19
万历	336	155	76	7	44	16	17	2	13		9		99	13	594	193
天启	74	10	15	5	10	5	8	2	3		2		19	1	131	23
崇祯	125	8	26	9	12	5	8	2	2		5		19	5	197	29
总计	1038	234	196	30	142	27	52	9	29	0	24	0	253	47	1734	347

(1621年)的五十一人,隆庆四年(1570年)的五十八人。隆庆四年这一科,乃是明代泉州在乡试中式举人的最高纪录,也是福建一府州在乡试中单科录取的最高纪录。

明代福建乡试九十科,泉州生员在这当中取得的文举人,加上参加顺天府和应天府被录取的文举人,共有一千七百三十四名,平均每科将近二十名。其中晋江仍占据多数,达到一千零三十八名。晋江以外,依次为同安、南安、惠安、安溪、永春、德化,名额见表四。

明代泉州的举人,不但数量在福建各府州中名列前茅,且在中后期有几科表现非常突出。隆庆四年这一科,泉州一府不仅中了五十八个举人,且出了两个解元,即晋江的李廷机中顺天府解元,同安的林奇石中福建解元,轰动一时。这五十八名举人中,后来有二十四人举进士,且李廷机获得榜眼又拜相。故从前府学明伦堂曾挂有“一榜两元五十八士”木匾,以示泉州文风之盛。自隆庆四年(1570年),至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二次乡试,十名解元为泉州夺得。其中万历十三年(1585年)至廿五年(1597年),竟连续五次夺魁,解元都是泉州人。在隆庆至万历期间泉州夺得解元的十榜中,还有一些泉州举子也取得好名次。如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这一榜,泉州还兼经魁一;隆庆四年(1570年)、万历元年(1573年)、万历七年(1579年)、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四榜,泉州各兼经魁二;万历十六年(1588年)、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两榜,泉州各兼经魁三;万历十九年(1591年)这一榜,五魁皆泉州人。可见,泉州在这期间的乡试中,表现非常突出。

表六:明代泉州解元一览表

乡试科年	干支	公元	解元	籍贯	该科举人数
洪武十七年	甲子	1384年	黄维清	晋江	76
永乐三年	乙酉	1405年	杨端仪	晋江	143
成化元年	乙酉	1465年	赵瑄	晋江	92
成化十三年	丁酉	1477年	蔡清	晋江	95
成化二十二年	丙午	1486年	林磬	同安	94
正德八年	癸酉	1513年	张岳	惠安	91
嘉靖七年	戊子	1528年	刘汝楠	同安	99
嘉靖十年	辛卯	1531年	陈让	晋江	94
嘉靖十六年	丁酉	1537年	章日闇	晋江	97
嘉靖三十七年	戊子	1558年	黄才敏	晋江	89
隆庆四年	庚午	1570年	林奇石	同安	115
隆庆四年	庚午	1570年	李廷机	晋江	中顺天解元
万历元年	癸酉	1573年	苏濬	晋江	100
万历七年	己卯	1579年	陈文选	惠安	102
万历十三年	乙酉	1585年	李光缙	晋江	99
万历十六年	戊子	1588年	潘洙	晋江	98
万历十九年	辛卯	1591年	黄志清	晋江	100
万历二十二年	甲午	1594年	王畿	晋江	99
万历二十五年	丁酉	1597年	洪承选	南安	99
万历三十一年	癸卯	1603年	林欲楫	晋江	105
崇祯九年	丙子	1636年	蔡高标	晋江	101
崇祯十五年	壬午	1642年	何承都	晋江	112
合计			22人		

明代泉州学子除在本省参加乡试外，还有寄籍应天府和顺天府乡试。明代规定，各省乡试只有本省籍士子才能参加，严禁冒籍。但当时南北两京各设一国子监，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国子监的学生来源广泛，除监生外，还有贡生。凡由府、州、县学选拔推荐到国子监学习的学生，通称贡生。明代贡生主要有岁贡与恩贡。岁贡是由各省学政在各府、州、县学廩膳生员中按年资选送，府学岁二人，州学二岁三人，县学岁一人。恩贡，是每逢庆典、颁布恩诏时，在岁贡名额之外加选的贡生，为皇帝特别恩赐，没有定制，也没固定名额。监生也分四类，这些贡生和监生，虽然要在乡试录取之后才能成为举人，并以举人身份才能参加会试考进士，这一点和生员一样，但是，他们可通过其它考选途径进入官场任职，其身份已和府、州、县学的生员不同了。按《泉州府志·选举》及《永春州志》载，明代泉州共有贡生一千五百二十二名，其中晋江五百九十四名，南安一百五十五名，惠安一百六十四名，安溪一百三十一名，永春一百四十七名，德化一百五十七名，同安一百七十四名。明初国子监生须住监读书，不便回本籍省与考，故令南雍监生在应天府参试，北监生在顺天府参试。两京乡试监生取额各为三十五人。因此，不少科年有泉州人在此两处参与考试，且考中举人。如隆庆四年，晋江人李廷机中顺天解元，这是很不容易的，这种情况明代的福建有六次。这些客居他乡的举子，在没有地利的情况下能高中解元，说明实力强大，也为家乡争光争举额。

乡试除考文举人外，还考武举人，内容以武功为主。成化十四年（1478年），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试策，随后试弓马。如策试通不过，则不得参加弓马骑射考试。次年，改定三年一试。正德十四年（1519年），定初场试马上箭，二场试步下箭，三场试策一道。武乡试与文乡试同年，亦

在省城举行，录取人数不等，一般不多。福建武乡试始于正德八年（1513年），终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共开科四十三次，录取名额在正德至嘉靖前期较少，一般在五人以下，有几科甚至只有一、二人。嘉靖后期名额增多，基本上在十人左右，二十人左右的也不罕见，最多的两科为万历三十一年及三十四年，分别达到二十七人和二十八人。泉州在嘉靖十二年（1533年）前的七科一直无人中举，嘉靖十三年俞大猷、邓城等首开记录。从此开始，表现却异乎寻常的突出，如嘉靖三十一年全省取十七名，泉州占十六名；嘉靖四十三年如是；万历十六年取十三名，泉州占十二名；二十二年取十二名，泉州占十一名；二十五年取二十一名，泉州占十九名；二十八年取十七名，泉州占十五名；三十一年取二十七名，泉州占二十五名；三十四年取二十八名，泉州占二十七名；三十七年取十七名，泉州占十五名。有几科泉州甚至包揽了全部名额。如嘉靖八年共取八名，隆庆元年共取九名，万历四年共取十一名，万历七年共取七名，万历四十三年共取六名，全部为泉州人。按《福建通志》载，终明一代，福建共取武举人四百七十六名，其中泉州就占三百四十七名，竟占十分之七左右，遥居各府州之首。泉州这些武举人中，不仅取得六个武解元，且有一些后来颇有成就。如抗倭英雄俞大猷，业绩众所周知。又如，南安人傅应嘉，字德弼，嘉靖三十一年武举第二名，授把总武职，协助俞大猷、戚继光抗击倭寇，战功突出，亦是明代抗倭名将。

乡试竞争是如此激烈，人们感到命运是如此难以把握，于是便有种种神话，种种传说，使考举人更具某种神秘感。《泉州府志·拾遗》中就载有不少这类的神话：晋江王塘李生，乡试前几年，就一再梦见乡里竖解元旗。醒来时想想村里的读书人，只有自己一人，于是兴奋不已，在书室内中到处题“解元”两字。谁知林欲楫先祖的坟墓恰在他村旁。几年后，林欲楫中解元，竖解元

旗于先祖墓前，李生才发现原来是个天大的玩笑，非常失望，从此不再参加科试。晋江人陈让，未中解元时，在泉州城内读书，每夜回家，经过陈翁桥，总听到桥上鬼神喊：“陈解元来。”陈很高兴，可连续参加几次乡试，均名落孙山。嘉靖十年，再次应试。公榜前，又经过那座桥，鬼神却寂然无声。陈回家后对其妻说：“我每年过桥，鬼都以解元相呼，今年却无声无息，是不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神明的事？”就在这一年，他中了解元。又载：陈让参加乡试前，求梦于九鲤湖，当晚自己并没梦见什么，倒是湖边庙中的道士梦见神说：“前度刘郎今又来”。道士将这话告诉陈，陈不得其解。这一科陈让中解元，才解开谜底，因为前科解元刘汝楠，陈让即前科之刘汝楠也。刘是同安人，也是陈让的同榜进士。笏江周维甲，参加乡试前数月，梦见有人拿榜给他看，榜上第五名叫周维×，但下一个字用手指遮住，不让他看见。周暗暗高兴，以为指甲就是自己的名。结果乡试发榜，登榜的是他的族人周维京，懊丧不已。林欲楫未中解元前，读书于宜亭馆中。馆的东壁悬挂着魁星像。某次，林家的仆人杨茂，偶然到馆中，恰好林欲楫外出，于是就在馆中睡了一觉。睡中梦见魁星神从壁上下来，伸出手说：“亏了我六年。”林茂惊醒，见魁星神又隐入壁中，非常奇怪。他将梦中的情形讲给人听，人们也都无法理解。就在这一年，林欲楫中解元，谜底才解开。原来，林欲楫因父母先后去世，按规制守丧六年，不得参加考试，耽搁了六年时间。朱梦贤的同宗中恰好又有叫朱贤的人，两人同时参加乡试，朱贤祈梦于九鲤湖，神仙对他说：“汝家今科所中的是朱贤”。朱贤非常高兴，以为必中无疑。回来后在路上遇到朱梦贤，问他梦见什么，朱贤如实告诉。朱梦贤听后笑着说：“你这是在替我做梦。你名叫朱贤，而所讲中举事乃是梦中话，明明指的是朱梦贤”。这一年朱梦贤果然中举，而朱贤竟落榜。

那些乡试中的佼佼者，人们总是津津乐道，无法忘怀，甚至载入志书。方志中就有不少这类的记载。如关于蔡道宪十八岁中举的故事。蔡道宪（1615年—1643年），字元白，晋江东石人，少时就很聪明，且有不凡抱负，嗜好读书，读到痛快时往往不忍释手。诸子百家之书，过目成诵，尤其《离骚》，更是滚瓜烂熟。所作文章，独抒心灵，别具一格，不步人后尘。时东石诗风鼎盛，文人墨客常在“三公宫”会诗，蔡也常到那里听诗会，耳濡目染，十多岁就写得一手好诗。十五岁那年元宵节，他参加“三公宫”诗会，与举人蔡尔良、庠生蔡炳玠等人吟咏唱酬。他以“三公宫”匾额“浮石钟灵”四字为冠，赋诗曰：“浮云蔽日几春秋，石砾当心负国忧；钟复两淮千古志，灵完三节万年留”。既颂扬了“三公宫”所崇奉的魏氏三公的不朽名节，又抒发出自己“负国忧”及“完三节”的报国大志。时人赞叹不已。十八岁中举人，二十二岁中进士。又如晋江沙塘的蔡一槐，也是泉州人心目中的神童。据府志载，蔡一槐少时就很聪慧，六岁往姑父家看灯，姑父试以对，说：“元宵灯火满街衢。”蔡脱口而出：“大地文章连斗柄。”十四参加乡试，成绩优异，本来完全可以登正榜。当时身为主考官的御史王瑛，读了他的文章，也觉得很不错，不过又认为，这么年轻就中举，不一定是好事，将来未必能成大器，故不让登正榜，而让他人副榜，下科再参加一次考试。这位主考官也许觉得有点过意不去，于是又令蔡一槐参加举人鹿鸣宴会。下一科，蔡一槐再次应试，终于中了正榜举人，是年十七岁。

泉州民间还流传着不少明代举人的故事。如王畿，字翼邑，号慕蓼，晋江人，生于明嘉靖年间。家境贫寒，父母因操劳过度，先后亡故，而家中还有年迈的祖父、祖母需服侍。为了糊口，王畿的祖父不得不先后把赖以活命的田地、房屋变卖净尽。王畿失去求学的机会，养牛、种田、做手工、卖糕点等事情，他都干过。祖父

母死后,他成为孤儿。但是,他求知欲望很高,每当他养牛、拾禾薪经过村塾,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时,都会驻足细听。日积月累,塾师传授给学生的知识,王畿也都学会了。没钱买书,便向别人借阅,时刻把书带在身旁。年岁稍长,他对四书、五经钻研逐步加深。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参加乡试,中了解元;四年后赴京会试,又得进士,从此走上仕途,历官杭州知府、江西右布政、浙江左布政等。为官期间,多次主持各类科举考试,少时自学的艰辛经历,使他非常注意人才的发现与选拔。为绍兴府教授时,聘为该府童试的同考官,对生员缴交的试卷认真批改。万历三十四年,主持四川乡试,被他发现和选拔的生员,以后都成为出色的人才;被他选录的文章,多数广为传诵;督学浙江主持乡试时,在全省的生员中,他第一个选中的是余姚人施邦曜。施未登科时家庭贫寒,订了一门亲事却无钱送聘礼。王畿曾经帮助过他。施后于万历四十一年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博士、工部员外郎。据说王畿参加乡试时,所带盘缠本来不多,考后又被小偷窃走了一些,所剩无几,便决意步行回家。时有个泉州士子,也参加同科乡试,欲雇轿回家。一个轿夫病了,临时找不到人顶替。王心想,我平时什么粗重活都干过,顺路抬个轿子,还能攒几个饭钱。于是受雇当了那位士子的轿夫。行至半路,忽有两个为考中者报捷的“报仔”从轿前经过,轿中的士子忙问要往哪里报喜,报仔答要到泉州。士子听了,便让轿夫停下轿向他们借取报录,看自己是否考中。王也趁势转头探视,结果发现自己中了解元,急急扔下手中的轿杆,高声喊道:“王畿中解元,此轿不用扛。”士子一听,才知这新雇来的轿夫,原来就是新科解元,惊恐万分,立即下轿,向王畿谢罪道贺。传说从此以后,凡是泉州的士子赴省考试,到了尚书岭,轿夫便照例向轿上的士子讨赏钱,士子为讨个吉利,总是乐意付给。“王畿中解元,此轿不用扛”这句话,泉州民间流传至

今,意指穷苦人有时也会出头,不能轻视。

中个举人不容易,要是一家有两人甚至更多人中举,自然更不容易,因而也更加风光,更为人们艳羡不已。明代的泉州,一家之中,兄弟或父子均中举人的,不在少数。甚至有兄弟同时中举的,如南安人黄华瑞与黄华秀兄弟。黄华秀,字居约,号同春,少时与兄华瑞就学于杨林书院,后入泉州府学,兄弟同窗,学业均优秀。万历十六年(1588年)秋闱,兄弟双双中举,时人誉之为“兄弟同榜,双凤联科”。次年春闱,黄华秀中进士,后官至浙江道监察御史。黄华瑞没有中进士,后授宁洋教谕,升国子监助教。

考上举人后,不少人继续前进,考上进士,有一些甚至是连捷登第,即在考上举人后于次年会试即考中进士。如戴一俊(1530—1607年),字惟宅,号卓峰,惠安人。天赋聪颖,十一岁参加“补邑诸生试”,就以优异成绩考上秀才,乡人都视他为“神童”。二十二岁中举人,第二年又连捷进士,可谓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只是后来仕途并不顺利。初授南京刑部主事,后知温州,又擢广东按察副使。三十八岁时因得罪权贵,被贬知雷州。深感官场的龌龊和险恶,不久即辞官返归故里,“优游绿野四十年”,直至终老,再无出仕。当的官不算很大,且在宦海生涯中只混迹了十多年。如朱昭,字用晦,惠安人,县志称他少颖敏,长作书吏,下笔辄数千言,以诗赋见称,写有不少诗文。其中《读书欢》是劝学诗,感叹自己终生不得志,没有科名,“一朝知自勉,读书苦苦迟”,希望后代以此为戒。因一生没有科名,耿耿于怀,苦督儿孙读书。在其严厉督促和谆谆教诲下,子孙有好几人获取科名。儿子朱一龙,嘉靖年间进士,官至江西布政司参政。孙子朱又焕,年十三补弟子员,天启元年(1621年)举人,次年连捷进士。如蔡复一,字敬夫,号元履,同安金门人。父用明,万历七年举人。蔡复一幼年聪慧,十二岁就写出洋洋万言的范蠡传,其父阅

后,十分惊异。十七岁与王畿同科举人,十八岁进士及第,殿试第七名。历官至河南右布政使,贵州总督等职。如金门人许獬,原名行周,生于书香门庭。从他出生之后,父亲就对他抱着很大希望,取名“行周”,希望他师法唐代著名文学家欧阳行周。据说,许獬读书非常用功,人也很聪明,有神童之称。九岁能文,十三岁淹贯经史,受到当时社会名流的赏识。学博郑燿称他为“天下才”,司理刘纯仁也认为他“当魁天下”,延引他到署中读书。许獬并不因这些称赞而自满,仍到处拜师求学,曾拜泉州名士李公缙为师,学到不少东西。考上秀才后,曾经写过《孟义》这篇文章,开始被学使摒弃不用,后徐北魁观风,再命这个题目,他仍按以前所写的文章献上,结果徐很赏识,拔为文章之首。许獬才学出众,万历二十五年中举人,四年后举进士第二甲第一名。如沈全期,字云右,南安水头人。从小刻苦用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崇祯十五年中举人,第二年登进士。柯实卿,晋江人,《东崖杂记》府载他为诸生时,触犯过一个官员,这官员怀恨在心,想压制他,于是在乡试前找了个借口,将他抓到狱中。这位官员又是当年乡试的阅卷官,临往省城之前,吩咐狱吏说:“等我走后数日,试期逼近,才可把柯实卿放出去”。狱吏照办。柯实卿被放出来后,试期已很逼,偶然遇到一艘顺风的海船,搭乘前往,一日一夜赶到省城,未误试期。考试完毕,那位官员在阅卷时,认得柯的卷子,非常惊奇地说:“这位狂妄的泉州生员,如何会赶得上参加考试呢?”很不甘心,将柯的卷子偷放于袖中,想带出去扔到井中,恰好主考官进来,问他:“有好的卷子让我看吗?”他不得已,只好把柯的卷子拿出来。主考官看后大为称赞,柯因此中了举人。遂以入彀。后柯举进士,官至太守。

但也有不少举人最终未能登上进士榜。如晋江人黄居中,十岁能文,万历十三年(1585年),与从兄黄汝良乡试中举。虽初授

上海县教谕,后又当过黄平知州,可惜老于公车。据载中举后,仍好学成性,读书不倦,晨昏不已,直至终老。每见稀罕书籍,往往亲自抄写下来。又喜欢购书收藏,尽毕生精力,藏书六万余卷,是著名藏书家。他曾因怕家人禁其夜读,常以笼蔽灯,不令人知,通宵诵读,故时人美称:“老而好学,斯无愧焉!”苦学如此,的确令人感叹,然毕竟终身未能举进士。如粘洪录(1580—1645年),字以焕,晋江人。读书等身,深究清源学派的朱熹理学。年轻时即于泉州城内学宫前设馆教授生徒,因其学问精妙,四方闻名来求学者甚众。大学士洪承畴曾叙及:“少时,先大夫每提命曰:‘郁庵粘公长者也,且文章妙天下,儿必负笈从事。’属是岁,馆先生者欲私其学,余不及受经门下,则先生以先大夫故,辄携余与郡名宿较艺论文,颇弘裨益”。万历四十六年,粘参加乡试,以《中庸·或利而行二句》为题,精辟地论述“嗜利欲”与“嗜理趣”两种不同动机引发为人处世的不同态度,中了举人。但随后屡次赴京参加进士考试,均落第。后选授为江宁府江浦县令,时已五十二岁。晋江人朱鉴,著有《奏议》等书,当时在泉州也以文名著称,中举后也未能举进士。

明代泉州一千七百多名举人中,后来中进士者近六百人,余下的一千一百多人则最终止于举人。一般举人要再考中进士仍须经艰苦搏击,即使那些乡试中表现优异的佼佼者,在进士考试中也并没有绝对的把握,可以稳操胜券。以明代泉州的解元为例,并非所有解元后来都有重大成就,甚至并非所有解元都能轻而易举地得到进士头衔。二十二名解元中,晋江占十六名,同安三名,惠安二名,南安一名。这其中后来较有成就的有蔡清、张岳、陈让、苏濬、王畿、林欲楫、李光缙、李廷机等。就举进士情况看,二十二人中后来有十六人登榜,但也有六人没有举进士,占到四分之一以上,即同安的林整、林奇石,晋江的李光缙、章日闾、蔡

高标,惠安的陈文选。明代泉州举人中进士的约占三分之一,依此看来,解元举进士比例甚至没有高出一般举人多少。十六位中进士的解元,连捷进士也不多,只有五人,即黄惟清、杨端仪、赵瑤、陈让、潘洙;四年后中进士的有六人,即张岳、刘汝楠、苏濬、黄志清、王畿、林欲楫。八年后登榜的有三人,即蔡清、黄才敏、何承都;十二年后登榜的一人,即李廷机;十六年后才登第的一人,即洪承选。

当然,包括个别解元在内的某些举人,后来所以没有成为进士,可能与他们对科举的态度有重要关系。如李公缙(1549—1623年),字宗谦,号衷一,晋江人,生于官僚家庭,父亲李仁曾官至户部主事。李光缙自幼慧敏,寓目成诵,举笔成章。他曾师事苏濬,深得先生赞赏,预言日后必成大器。十九岁时为秀才。万历十三年,三十六岁时举乡试第一。但是在中解元后,“并不沾沾学子业”,也不去为官,而是“杜门著书”。又如李贽,嘉靖三十一年,二十五岁的李贽参加乡试中举。但他看不起用八股文考试的科举制度,嘲笑考官无能,说自己参加考试,只是当一名誊录生。以后便不应进士考试。如此,自然与进士无缘。不过,这毕竟不是普遍的现象。

明代泉州的进士

明代举人要成为进士,必须参加会试且中式。会试是第二级考试,也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在乡试的第二年,即丑、辰、未、戌年,于京师礼部举行,故又称礼闈。明代泉州同安县在北京有同安会馆,平时为同乡官员和士人的联谊聚会场所,遇会试之岁,则为进京应试本籍举人寄居服务之所。参加会试的必须是乡试中式的举人。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

行,故又称“春闈”。考试的内容和程序,基本上和乡试一样,但难度更大。因为会试是比乡试更高一级的考试,是从大量举人中选拔出等额贡士参加殿试,竞争很激烈,明统治者对它更重视,考场管理也更严密。因殿试时只是按成绩重排名次,并无黜落,故会试中式后,便称进士。第一名称会元,第二至第十八名称会魁。会试的录取人数,明初没有定额。最少的一次,只有三十二人,最多达到四百七十二人。名额的增减,皆临期奏请皇帝定夺。成化十一年(1475年)以后,一般取三百名。明初会试取士,不分南北,洪熙元年(1425年)始分南北录取名额,南人占十分之六,北人占十分之四。宣德(1426—1435年)以后,则基本上分为南、北、中三卷,在一百个名额中,南卷取五十五名,北卷取三十五名,中卷取十名。福建属南卷,取额亦较多。明代各省取额大致根据省之大小,应试人数之多寡与文人水平之高低而定。福建在领域与人口上并非大省,但在应试人数与文化水平上属大省,故取额较多。会试中式后,还要经过复试,然后参加殿试。

殿试是第三级考试,也是明代科举的最高一级考试,因考场设在奉天殿或文华殿而得名,凡会试中式的都可参加。殿试是皇帝“亲策于廷”,亲任主考官,故又称廷试。评阅试卷的大臣只称读卷官。殿试试期为会试当年的三月初一,成化年间改为三月十五日。殿试的内容很简单,仅试时务策一道,以一日为限,日落前须交卷。殿试一概不黜落,只是重排进士名次。但名次排列的依据,并不怎么看重策试的成绩,而以字写得好坏和是否有错别字为主要标准。名次分一、二、三甲。一甲只三人,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视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俗称传胪。当时乡试第一名称解元,会试第一名称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称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场的巅峰,明代只有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